

【丁言昭 著】

一代红色女谍的跌宕人生 一段刻骨铭心的英雄往事



关露传

她是唯一
一位深入“76号”魔窟与日
伪特务较量的红色女谍，也是一位闻
名海上的“左联”女诗人。她吟出过“宁为
祖国战斗死，不做民族未亡人”的铿锵诗句，本
应该在诗坛大放异彩的她，却甘愿拿自己的生命和
名誉为新中国的诞生奉献。

上海文化出版社

关露传

「丁言昭 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关露传/丁言昭著. - 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9

ISBN 978 - 7 - 80740 - 425 - 5

I. 关… II. 丁… III. ①关露(1907 ~ 1982) - 传记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60956 号

出版人

陈鸣华

责任编辑

周莺燕

装帧设计

许 菲

书名

关露传

出版发行

上海文化出版社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网址:www.shwenyi.com

邮政编码:200020

印刷

上海市印刷十厂有限公司

开本

787 × 1092 1/18

印张

11 1/3

版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80740 - 425 - 5/I · 549

定价

28.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 - 65410805

序

电台正播送一首声情并茂的男声独唱歌曲：

“春天里来百花香，朗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和暖的太阳在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朗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穿过了大街走小巷，为了吃来为了穿，朝夕都要忙。……”

这是电影《十字街头》的插曲，由贺绿汀作曲，而它的歌词创作者就是本书的传主——关露。

关露出生于1907年，1982年去世，2009年是她的102岁诞辰。

关露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女作家、女战士，她坎坷的人生经历也给世人留下了种种谜团。关露对中国共产党革命事业无比忠诚，并具有浪漫的情感，因而她的一生既曲折又朴实，由一根红线贯穿始终。

关露10岁时，父亲不幸去世。少年失怙，家道中落，这使得早年的成长过程遍布艰辛，那独异的禀赋和气质大都得力于母亲的影响。

关露母亲是一位受过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具有时代的女权意识，身为长女的关露在亲情之中过早地觉察到母亲的身心痛苦，这样的童年经验，一定程度上框定了她的性格走向。

母亲很关注对孩子的教育，这使关露在青春时期最大限度地接受了古文、外语、美术、新文学、哲学和法律等各方面的教育，因为种种原因，她还曾经辗转太原、南京、长沙、上海各地，丰富的生活阅历，拓宽了心灵世界，熔铸着精神生命。

关露给人的印象是一个温润而柔弱的知识女性，但那只是她的表象。了解关露的人都知道，关露对于大是大非问题态度鲜明，她的处事风格泼辣，她的意志有着常人难以达到的坚忍不拔。

关露的文学创作开始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三十年代进入黄金阶段。1939年她奉命秘密打入敌伪阵营，成为抗日战线中的一匹“特洛伊木马”，后来上级又派她到日本人办的杂志去当编辑。关露身在敌营，处境险恶，亲友和社会不明真相的人，将她误认为民族败类，一时声名狼藉，而关露忍气吞声，无怨无悔。抗战胜利之时，上级领导及时将她接到苏北解放区给

予保护，可到了五十年代，由于潘汉年案的牵连，关露蒙冤长达二十多年，致使晚境孤独凄凉。关露为革命牺牲了荣誉、牺牲了爱情、牺牲了健康……

令人欣慰的是，自从电视连续剧《潘汉年》播放后，不少知情人纷纷写出回忆文章，以还原一个真实的关露，有关关露的传记近年来也陆续问世。关露为了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在最危险的地方收集情报、暗中支持进步青年，出色地完成了党组织交办的各项任务，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为共和国作出特殊贡献的关露。

目录 *contents*

序/ 1

- 1 多难的童年/ 1
- 2 投身革命事业/ 9
- 3 畅游于诗歌海洋/ 22
- 4 与丁玲的友情/ 43
- 5 繁忙的岁月/ 52
- 6 坚持在“孤岛”/ 68
- 7 自传体小说三部曲/ 77
- 8 深入虎穴/ 83
- 9 将《女声》为我所用/ 92
- 10 日本之行/ 111
- 11 苦恋/ 119
- 12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133
- 13 第二次被捕/ 151
- 14 浓浓的亲情/ 159
- 15 最后七年/ 165
- 16 怀念/ 172

附录:

关露生平年表/ 179

关露著译目录/ 186

后记/ 197

1 多难的童年



＞ 1980年9月30日，作者访关露（坐者）

我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寻访关露。

记得第一次见到关露的名字，是在别人写我父亲丁景唐的大字报上。众多的罪状中，有一条就是说他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为汉奸刊物《女声》投稿，而该刊的编辑之一就是关露。在那是非颠倒的年月里，不要说没影的事会给你说得有鼻有眼，更何况《女声》的主编确实是个日本人，那么在《女声》当编辑的、投稿的，自然可以戴上“汉奸”帽子，而且证据确凿。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父亲才告诉我，是党组织派关露打进去做秘密工作的。我听后，十分惊异又佩服，从此就产生了要为关露写传的念头。

在没见关露的时候，她在我脑中的形象是根据她妹妹胡绣枫的样子来想象的：中等个子，胖乎乎的，头发梳得光光的，可是当我1980年9月在北京香山见到关露时，觉得她长得是那么瘦小，衣服却穿得很干净，洗得一尘不染，短发确实梳得很整齐。

自从见到关露后，我陆续写过《介绍诗集〈我歌唱〉》、《关露的诗》等，编了关露的散文集《都市的烦恼》，但一直没敢动手写传。我自认对关露是相当熟悉了，可是真的拿起笔时，才发现关露在我脑子里只是个平面形象，于是我重新读了她的作品，并采访了胡绣枫、李剑华、杨丰、任钧、陈慧芝、李兰、张耀华、钟潜九、陈明、林艺、司空谷、羽山等前辈；同时发信给梅益、游寿、陈子展、沈澧莉、王炳南、许杰、郑曼、林焕平、柯灵、苏金伞、碧野、徐鸿等人。他们中有的是关露的亲人、同学、朋友，有的是我父亲的朋友，有的与我素不相识，但对我都真诚相待，热情帮助。



＞ 山西右玉

关露的妹妹胡绣枫，年事已高，社会活动多，身体又不佳，有一次我去她家时，没想到她正躺在床上打点滴，但她亲切地让保姆拿个凳子叫我坐在床边，接着就开始与我聊起了关露……总之，对我这个差点把他们家门槛都要踏破的来访者，总是不厌其烦地接待。本书中许多珍贵的材料都是胡绣枫提供的。下面让我们来说说关露吧——

1907年7月25日(阴历六月十六日)，在山西省右玉县这个长城边上偏僻的小县，一个新生命诞生了。胡举人望着襁褓中的婴儿，喜滋滋地要给孩子起一个名字。“仙”、“兰”、“花”、“彩”……这些虽然是女孩名字中常见的字眼，但未免显得太俗。他不断搜寻着读过的文章。忽然，他想到一句古谚：“生女亦可壮门楣”，便如获至宝。这一代正是寿字辈，加上一个“楣”，胡寿楣就成了她的名字。

到了三十年代，胡寿楣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关露，为了叙述和阅读方便，在这儿就开始用关露的名字。

关露望着周围陌生的一切，哇哇啼哭着。她哪里懂得，此时，苦难的祖国正遭受着多么重大的不幸：反对封建帝制的巾帼英雄秋瑾饮恨于刽子手的屠刀之下；日本与沙俄订立了第一次《日俄密约》，瓜分着中国的东北三省……谁也没料到，这位出生于长城脚下的姑娘，将在日后的岁月里，为祖国的命运，民族的存亡，人民的事业，用她那壮丽的青春和宝贵的生命，书写出“壮门楣”的悲壮篇章。

关露的父亲名叫胡元陔，号运南，祖籍河北省宣化县，即当时直隶延庆府。他赶上了清王朝科举的末班车，考中举人，但他不满足于已取得的功名，还想考进士，便跑到北京去应试。

在北京，胡元陔结识了俞恪士。当时胡元陔四十多岁，俞恪士才18岁，两人却一见如故，谈天说地，吟诗作文，成了忘年之交。交谈中，俞恪士得知胡元陔新近丧妻，还未续娶，就向他谈起自己表姐有个女儿叫徐绣风，正闺门待字。胡元陔一听心中有意，便请俞恪士去征求他表姐的意见。

徐绣风出生在福州，父亲是江苏省六合县人。她3岁时父亲就去世了，以后就靠娘家生活，长大后，由娘家人介绍保送到中国第一女子学校——旅宁中学就读（三十年代改名为南京师范学校）。她自幼勤奋好学，有许多趣闻。有一回，端午节吃粽子，徐绣风一边看书，一边漫不经心地拿着粽子蘸糖吃，直到家里人见她满嘴乌黑，惊叫起来，才发现原来自己蘸的是砚台里的墨。还有一回，徐绣风专心致志地读书，竟然连蜈蚣爬到了手上也没发觉。她不但会作古文、画画，而且写得一手漂亮的小楷，能工刺绣。

此时徐绣风已经二十八岁，早过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她并不是因为无才无貌嫁不出去，而是因为中年丧夫的母亲，拉扯三个孩子，辛苦了半辈子，想找个能养老送终的女婿，这样七挑八拣，女儿的婚事就被耽误了。

俞恪士把表姐家人的意思对胡元陔讲了，胡元陔欣然同意照顾她们一家，于是徐绣风在母亲的陪同下，到山西去完婚。

婚后，小两口的生活很是美满、和谐。丈夫在县里当七品芝麻官，妻子在家陪伴着母亲。家中雇了一名男佣，专管烧饭和买东西，还雇了一个洗衣娘，每隔几天来浆洗衣服。

丈夫虽然长她18岁，但对她很是疼爱体贴，结婚以来，只发生过一次小小的口角。那次口角很有意思——

一天，徐绣风在外间陪一位朋友说话，胡元陔在里屋，时间一长，胡元陔想解手，但外间有陌生女客，他不敢出来，只得憋着。等客人一走，胡元陔立刻冲出屋子，把徐绣风吓了一大跳。胡元陔回屋后，把徐绣风责怪了一通。不过，没过一个时辰，两人又和好如初了。

在关露出生一年半后，即1909年2月，妈妈又给她添了个小妹妹，叫胡寿华，长得酷似母亲。因为是生在太原小仓巷，所以小名又叫小仓。胡寿华参加革命后改名胡绣枫，一方面是为了纪念母亲，另一方面是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捕。

徐绣风的母亲跟着女儿在华北过了几年，颇想回南方住一阵。于是，1914年，徐绣风陪着母亲带了六七岁的关露，到南京徐双鲤二姐家住了些日子，接着，将母亲和关露留在南京，一个人回到在山西保德当县知事的丈夫身边。

1916年，胡元陔从大宁县卸任回家，他租坐的是一辆骡车，一路上颠簸不堪。途中一行人在榆次县打尖吃饭，饭后胡元陔突然半身不能动弹，折腾了一个晚上，翌日便去世了。

噩耗传来，徐绣风悲痛欲绝，丈夫突然撇下她和两个女儿而去，叫她一个妇道人家如何是好呢？

徐绣风还算是有胆识的女子，她悲恸之后，很快冷静下来，设法筹钱给丈夫料理后事。胡元陔虽然做了多年的县太爷，但他为官清廉，临终还是两袖清风。徐绣风变卖了家中的一些东西，又叫胡绣枫把平时舍不得用的压岁钱拿出来，总算凑了点儿钱，买了几十块白木板，请



山西省立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已经不复存在，图为太原师范纪念馆

人做了口薄棺材。

徐绣风又将噩耗通知了丈夫前妻的儿子，请他前来帮助她一起把灵柩护送回河北延庆故里。她原来指望着那儿子可以为她分担点忧愁。谁知他一踏进门就冲着她要遗产。徐绣风告诉他，丈夫生前没有留下什么财产，他不信，把里里外外搜罗了一遍，当他发现确实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时，一气之下竟拂袖而去，从此再也没露面。

夜复一夜，孤灯伴影，徐绣风想给母亲写封信，每每拿起笔，总是欲书又止，久久未流的眼泪，滴滴答答地落到地上，好像停留在树叶上的雨点叫风吹落了一样。徐绣风排行老三，两个姐夫已先后去世，如果母亲知道三女婿也走了，不知会悲痛到何等地步。徐绣风决定暂时不把这件事告诉母亲，仍按月给母亲寄去十元大洋。做母亲的哪曾想到，钱上沾着女儿的泪和血啊。

丈夫去世后，一家四口的生活重担落到了徐绣风的身上。在那个世道，一般人找份工作尚且不易，一个妇女要找事做更是难上加难了。徐绣风的脸上过早地布满了皱纹，细小的皱纹，像河道的分叉，流淌着从全身心里渗透出来的劳累和疲乏。当时衙门里人手不够，公文来不及抄，就拿出来叫别人抄写，叫做写“白楷子”。在上好的宣纸上抄写，字迹不但要极端工整，而且要写蝇头小楷，没有相当的书法功力是不行的。徐绣风被录用后，虽然报酬很少，但总算有了经济来源。可是，抄写的活不能保证每次都有，于是她还得经常用刺绣来挣钱贴补家用。每月给南京的母亲寄去十元大洋后，家中所剩无几。为了养家糊口，还得经常去当铺，有时连胡绣枫的小衣服也在当铺里出入，因此胡绣枫从小就对当票非常熟悉。

这样勉勉强强生活一段时期后，徐绣风遇到了丈夫的一个朋友，那人姓赵，是阎锡山手下的一名参谋。经他介绍，徐绣风到山西省立师范学校和师范附小同时兼课，教语文。有了固定的工作和收入，徐绣风才得以把母亲和关露接到太原。那年关露已虚岁十一岁。

徐绣风一家住在宁化府，土木结构的一溜平房，在当时属中下等

居所，日子还算过得去。徐绣风在山西省立师范学校附属小学结识了一位姓常的女教师，彼此谈话颇为投机。不久，徐绣风便邀请常老师搬过来一起住，一是可以做伴，二是可以分担些房租。徐绣风和关露住两间西房，徐绣风的母亲和胡绣枫住东房，常老师夫妇和婆婆住在朝南的上房。两家相处甚密，徐绣风让两个女儿称常老师为常干娘。

关露跟着母亲在师范附小读书，徐绣风怕姐妹俩在一个学校读书会吵架，从而影响功课，便让胡绣枫在公立小学读书。晚上两姐妹则跟母亲读四书五经和古诗。虽然关露只比妹妹大两岁，却处处做出姐姐的样子，从不贪玩，每天按照母亲的规定读书、写字，或学着作文、写旧体诗。关露的思路敏捷，不管作文或写诗，往往是妹妹才刚刚开了个头，她就已经完成了。姐妹俩究竟年纪还小，有时也免不了放下书讲闲话。有一次正巧被母亲撞见，气得她嗓子眼里像噎着一团冒烟的棉花，二话没说拿出一把尺就打两人的手心，打完后又心疼地抚摸着她们的小手。母亲的心是水做的，生气的时候是冰，暖一暖就仍旧是水。她说：“一个女孩子一定要学点本领，长大后才能够自谋生活，否则将一辈子受气，一辈子抬不起头来做人……”母亲语重心长的话，深深地印在关露幼小的心灵里，从此，她愈加奋发地学习。

母亲对女儿也不放松道德方面的教育，关露记得，有次她对佣人不礼貌，遭到了母亲严厉的训斥：“他们虽然是佣人，但在人格上是与我们平等的。”

徐绣风白天兼两所学校的课，晚上教自己的孩子，另外还要操持家务，服侍老人，终于累病了。

常老师热情邀请徐绣风到长沙乡下她哥哥家养病。徐绣风考虑到，一来可以节省家庭开销，二来可以避开上回没要到遗产的继子上门纠缠，于是带着老母亲和两个女儿，随常老师到长沙郊区。

农村里往往谁家来人，全村立刻就会传开，像徐绣风这样一个有知识的女人就更引人注目了。村里有一大户人家，拥有上千亩土地，造了一座大宅院，叫梅花庄，地上铺着大方砖，非常气派。户主叫张百熙，晚清曾经在北京主持京师大学堂，派遣留学生出国，后当过礼部侍郎和户部尚书。1905年改立官制，还出任过邮传部大臣。徐绣风到长沙那年，张百熙已去世多年，但家族仍甚旺盛。一天，张百熙的儿媳妇上门来，请徐绣风教她的女儿读书。

第二天，来了五个女孩子，四个是张百熙的孙女，一个是张百熙的女儿，叫张瑞。徐绣风每次给她们讲一两个小时的课，另外再教自己的女儿。徐绣风对自己的女儿特别严格。她的英语根底厚实，是在太原跟外国传教士学的。可当孩子们提出要学英语时，她却执意不允。她对孩子们说：“先把古典文学学好，因为它比英语难学，又实用。至于英语，以后我会教你们的。”

徐绣风要求学生每天背一段古文，最后还要通背，就是说要把整本书全背出来，背不出就

用戒尺打，所以到了今天，胡绣枫还能大段大段地背诵小时候学过的古文。

徐绣风和乡亲们相处很融洽，一天邻居过生日，请她去喝酒。徐绣风有点酒量，但平时滴酒不沾。这天因为高兴，喝了很多白酒，以至于醉倒，回家就生病了。她成天喊口渴，通宵地喝水，造成全身浮肿。先请了个医生治疗不见效，又换了个医生，开了帖凉药，服后才稍好些。

徐绣风刚生病时，就写信给二姐徐双鲤，要她从南京来见上一面。徐双鲤赶到长沙乡下，见妹妹病成这般模样，不禁伤心起来。徐绣风拉着她的手，说：“我如有三长两短，母亲和孩子就托给你照顾了。”徐双鲤叫她不要胡思乱想，静心养病。徐双鲤在妹妹处住了相当一段时期，见她身体虽虚，但不会发生意外，就回南京去了。

几天后，徐绣风感觉好了点，能起来走走了。她忽然起了个念头，要到长沙城里亲戚家去玩玩。并请人做了短袄、长裙和两套新衣服。衣服做完后，她又说，要再吃几帖药，让病好得彻底些，出去玩时走路多点力气。谁知一帖凉药吃下去后，病势反而加重，躺在床上昏昏沉沉起不了身。有一天，她说要吐痰，还没等家人去扶，她已挣扎着坐起来往床角上吐，躺下后却没再醒过来，第二天下午去世，时年46岁。

常干娘张罗着徐绣风的后事，徐双鲤接到电报从南京赶来，八十多岁的老母亲抱着女儿徐绣风哭得死去活来……

关露这时还不满16岁，仿佛一下子长大了许多，在短短几年里接连失去双亲，这打击是够沉重的了，凄楚、悲痛、孤独……她泪眼前时时闪现着母亲的身影，耳边响着母亲的教诲。

母亲是关露人生旅途中的第一个老师。由于母亲思想开通，她没有受到裹小脚和穿耳洞的苦痛，反之得到的是享用一辈子的知识。母亲经常说：“要好好读书，有了知识才不会受气。将来如果你们不愿结婚也可以，但一定要有本领，能够独立生活，自谋生路，不然一辈子受苦……”

母亲去世后，两个孤女，一个老太太，身在异乡，举目无亲，生活更无着落。幸亏老太太想起有个表侄在长沙，连忙打点行李，去投奔表侄，关露姐妹俩叫他表舅。

在表舅家里，关露跟一位家庭教师读了一年书。那位老师叫吕雨湘，是清末的进士，因不善钻营，没有做过什么大官，只好当家庭教师。他很同情关露姐妹，所以授课连学费也不收。不久，因生活无着，关露只好跟着外祖母到南京，和二姨母徐双鲤一同居住。

二姨母这个名字有个来头，她出生那天，有个朋友送来两条大鲤鱼，所以取名徐双鲤。成年后由母亲做主，把她嫁给一个姓李的人，可是儿子还没有出生，丈夫已去世。儿子生下不久，也追随其父亲而去。后来徐双鲤过继个儿子，长到20岁也死了，接着又过继一个儿子，却对她很不好。实际上，二姨母是个孤苦无依的人。她虽也读过点书，但只能看看旧小说，找不到职业。



＞ 司徒乔与冯伊湄(左)

李家有几十间房子，兄弟各立门户，分给徐双鲤三间。一间自己住，另外两间租出去，每月收房租，再加上给鞋店绣花，赚些微薄的收入来糊口。她每月借酒浇愁，一面喝酒，一面看小说，一面发牢骚，埋怨自己命苦，又埋怨母亲没有给她找个富裕的婆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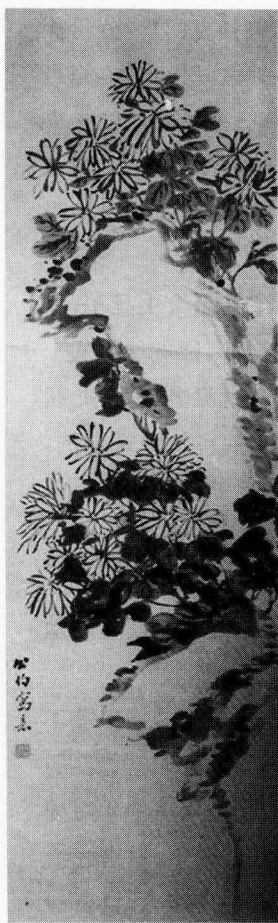
二姨母有个堂房侄女，父亲是个书呆子，精神不太正常，高度近视，架着一副像玻璃瓶底一样厚的眼镜。由于没有工作，就靠老婆、女儿绣花挣来的钱生活，家境很是清苦。这种绣花鞋是专供新娘上轿穿的，讨个吉利，穿过就扔掉，所以销路还可以，只是双手不能停。不知是遗传，还是用眼过度，女儿也是近视眼，后来嫁到安徽去了。

看到这些女人的遭遇，关露愈发觉得母亲说的话对了，女人家一定要好好读书，学点本领，才能在社会立足。于是她更加孜孜不倦地求学，到处寻师访友，还特地到基督教青年会去补习英文。

二姨母有个亲戚的邻居叫陈思萱，是个画家，与关露家的境况差不多，也是跟着外祖母生活。陈思萱有个画友叫冯伊湄，是个非常善良的姑娘，比关露小一岁。冯伊湄童年时随父住香港，后到南京美专学习国画。从上海大学文学系毕业后，又赴法国留学，1930年回国，后来嫁给了著名的画家司徒乔。司徒乔与冯伊湄是大同乡，都是广东人，自署白薯画家，著有《白薯画家日记》。1926年6月举办画展，其中《五个警察和一个○》、《馒头门前》为鲁迅选购，1928年底赴法深造，曾师从写实派画家比鲁。1930年赴美半工半读。翌年回国，任岭南大学西洋画教职。1936年鲁迅逝世时，含着眼泪为他画了遗容，题为《鲁迅先生遗像》，刊登在《生活星期刊》。可惜司徒乔在1958年即在京逝世。

我在1931年12月出版的《良友》第64期上，见到一张冯伊湄与司徒乔的合影，是他们俩度蜜月时，经过上海在良友摄影室里拍的。冯伊湄含情脉脉地依偎在新郎的身边。

通过冯伊湄的介绍，姐妹俩认识了南京美术专科学校的教授梁公约先生。梁先生当时五十多岁，他去找校长商量，让姐妹俩免费进校读书，学习国画。学费虽然是免了，可是画具、纸张、颜料还得自己掏



关露曾师从梁公约学画，此为梁公约画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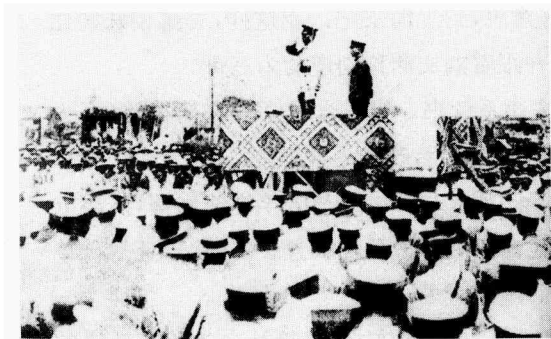
钱买。那时，单宣一毛钱一张，双宣二毛钱一张，她们姐妹俩生活都难维持，哪有钱买这些东西。读了不满一年，实在难以坚持，只得自动退学。

外祖母的父亲曾在四川、湖北当官，太平军起义时，调到福建对付农民军。当时外祖母才七八岁，她随父亲到福建，后来在那里结婚成家。外祖母虽然是小脚，但喜欢穿男装，跟兄弟一起出去看戏、观灯。外祖母尽管受到新潮思想的影响，但毕竟大部分受的是封建传统教育，二姨母就更不用说了，她俩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唯一的出路就是结婚，找一个家道富裕的丈夫，就可以过一辈子幸福生活。她们认为自己生活所以艰难，全是因为命苦，没遇到有钱有寿的好丈夫。因此外祖母和二姨母为关露姐妹俩日夜操心，不停地为她们找好婆家，也有亲友不时地上门来做媒，首当其冲的自然是当老大的关露。

关露人不大，主意可大了，她决不屈从于这种包办婚姻，决定不放弃自己的学业。就是要嫁人，也得自己学有所成，能够自食其力，才给予考虑。于是，为了婚事她常常和外祖母、二姨母发生矛盾，不管做媒的来说什么人，她一概拒绝。这使两位长辈很不高兴。就在她为这类事情烦恼时，一直和她们保持联系的吕雨湘先生来信请关露到河北怀安去当小学教师。和她们一起来南京的常干娘听说后，不大赞成，认为她在学业上还没有多大成就，当教师是难以胜任的。关露仔细想想觉得有些道理，打消了去怀安的念头。

外祖母 1934 年去世，享年 90 岁，要不是摔了一跤，也许还可以长寿些。二姨母死得很惨，当时她仅靠收房租生活，而房客们不是赖账，就是拖欠，只有一个人能按月交房租，每次七八块钱。可惜这位好房客在 1939 年被日本人打死在窗下。二姨母没有了收入，最终被活活饿死，时年六十多岁。

2 投身革命事业



➤ 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

1926年,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从广东出发势如破竹。1927年东路军进入长江下游地区,不久便与孙传芳军相持于江西,这些日子南京城里常有战争的消息传来,弄得人心惶惶。

关露姐妹想去外地找个地方避难,但苦于没人做伴,也不知上哪儿去。正巧常干娘从长沙到南京来玩,于是1926年冬天,常干娘带着关露和胡绣枫绕道上海去长沙。在去上海的

船上,她们碰到常干娘朋友的儿子,叫阎径仲,他对常干娘说:“到上海最好住到我姐夫刘道衡家中,因为他们的家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上,属于法租界,相对比较安全些。”常干娘听了,觉得挺有道理,一到上海,就带着两个姑娘住进了刘家。

刘道衡的脸长长的,眉毛浓浓的,蓄着鲁迅那样的胡须,似浓墨写的隶体“一”字,给人一种慈祥、厚道的感觉。他是留日学生,在日本参加同盟会,与孙中山很接近。

刘道衡的大哥叫刘崧衡,写得一手好文章,原在谭延闿手下工作。辛亥革命前夕,湖南的立宪派和革命派都有相当力量,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湖南革命派积极准备起义,谭延闿顺风转舵附和革命。1912年3月,袁世凯接任临时大总统,7月正式任命谭延闿为湖南都督。1913年7月,孙中山发动了讨袁的“二次革命”,江西、江苏、安徽等省纷纷宣告独立,组织讨袁军。谭延闿在7月25日假意宣布“独立”,不久,江西、南京方面讨袁军先后失败,谭延闿便在8月13日通电取消“独立”,并且杀害了坚决反对取消独立的革命党人刘崧衡等。

从此以后,刘道衡再也不相信国民党,认为国民党内没有好人。

他不再过问政治，在交易所里开个户头，每月赚几百大洋。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波及到中国，1932年日本军方又在上海挑起了“一·二八”事变之后，刘道衡才放弃了这个营生。1932年他参加中国共产党，奔波于上海、南京、湖南，做情报工作。1969年“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此是后话。

常干娘和关露姐妹商量后，觉得初次见面就麻烦人家，不太好意思。最后决定姐姐留下，妹妹跟常干娘去长沙，再去武汉，住在陈慧芝家。由于没有经济来源，生活就发生了困难。

刘道衡知道后，就叫关露写信告诉妹妹别不好意思，到上海来吧。就这样，关露和妹妹住在刘家，与刘道衡的小妹妹刘文渊同住在亭子间，并跟着刘文渊称刘道衡为三哥。

刘道衡全力资助关露，送她到上海法科大学法律系读书。当时这个学校在蒲柏路（今太仓路西段，北段解放前叫白尔路），1928年下半年搬到江湾后，改名为法学院。

关露进校时，教务长是沈钧儒。他是著名法学家，曾留学日本，1907年学成回国，从事立宪活动，参加辛亥革命，先后加入同盟会和南社。他在任上海法学院教务长的时候，还执行律师业务，参加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

学校的教师和学生中，有不少是职业革命家和爱国志士，其中如讲授社会学和劳动法的李剑华，很早就接受革命思想，1925年从日本回国后，应中华学艺社创办的学艺大学之聘去教社会学。1927年，李剑华在法科大学任教授时，在课堂上抨击黑暗社会，宣传新思想。关露从他那里第一次听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也第一次知道了“反对不合理的制度”、“反抗私有制”等新名词，她感到自己是多么渺小，天地是多么博大，世界上还有这样灿烂、神圣、庄严的事业。几年后，李剑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关露在上海读大学，家里的长辈忙着给她找婆家。家里人知道她的脾气，如果明说回来相亲，肯定会碰一鼻子灰，所以谎称外祖母病重，要她立刻返宁。关露收到信后，忙不迭地赶到南京。踏进门，发现外祖母的身体并不像信上所描写的那样糟糕，本想马上返沪，但外祖母和二姨母都苦苦地挽留她，说：“既然回来了，就多住几天吧。”关露想了想，就答应了。

有一天，大姨母的儿子来看关露，并约她出去吃西餐。关露推脱不得，随他去了。席间，这位表哥谈及要给她介绍一位银行经理。关露听后，把脸一沉，立即回绝。

两位长辈事先是知道这门亲事底细的，总以为姑娘该满意了，谁知仍不同意，这可惹恼了外祖母和二姨母，她们斥责关露不识抬举，不听老年人的话，将来肯定要吃苦头的。但关露仍不为所动，决心走自己的路。

1928年5月3日，发生了济南惨案，简称“济案”。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二次北伐，进攻北方奉系军阀。日本军方为了阻止北伐，借口“保卫侨民”，悍然出兵侵占济南。

5月3日，日军突然进攻北伐军，打死打伤中国军民三千六百余人，而且不顾国际惯例，惨

杀南京国民政府驻济南的外交特派员蔡公时及 17 名随员。蔡公时被日军残酷地剃下耳朵、鼻子，剃去双目，当蔡公时血流满面痛骂日军“中国人可杀不可辱”时，日军竟丧心病狂地将刺刀插进他的口中，剃去他的舌头。日军的暴行，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怒，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日浪潮。

谁知日军竟谎称蔡公时是在战争中被机关枪射死的，并要南京政府道歉、赔偿、惩凶。面对日军的无耻行径，南京政府决定成立对内对外两个委员会。为了向世界人民说明济南惨案的真相，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上海学联派了著名诗人徐志摩到美国。

1928 年 6 月 8 日《时事新报》第 3 张 4 版，刊登了这样一条消息，标题为《市学联聘徐志摩任驻美国国际宣传》，其内容如下：

上海特别市学生联合会因鉴济案发生后，世界各国多未明真相，故对国际宣传诚属不可少，爰分别聘任驻外各人任国际宣传全权代表。兹闻已聘就徐志摩君为驻美该会全权代表云。

这时各大学联合上书，抗议日军，法科大学也鼎沸起来，爱国师生纷纷上街游行示威。沈钧儒带领一队师生，高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在街头宣传抗日。年轻的关露第一次接受了爱国主义的洗礼，民族、祖国、尊严……随着汹涌的浪潮卷进了一个年轻大学生的心田，新思想的种子在关露心中开始生根……

1928 年春，胡绣枫也考进了法科大学法律系，与姐姐同校学习。1928 年秋，法科大学迁到江湾路，如走读，路远不方便；如住校，花费又太大。因此，胡绣枫转学到法政大学，每天只花六分钱的车费。关露一心想进南京的中央大学，一则那是名牌大学，二则学费便宜，能为刘家减轻负担。有志者事竟成，她刻苦攻读，于 1928 年暑假，顺利考入中央大学哲学系（后转到文学系），回到了南京。

关露在学校住宿。该校女生宿舍与校本部是分开的，中间隔一条中山北路，宿舍在路西，教学楼在路东。女生宿舍是坐北朝南的二层楼房，正前方是食堂和空地，周围有许多梧桐树。教学区的正中是圆顶大礼堂，东面是图书馆，最北面有一棵历经六朝的古柏。校园里绿树成荫，芳草萋萋，关露在这里读了三年书。

由于母亲的熏陶，关露从童年起就对文学，特别是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中央大学可以说是一个孕育新诗人的摇篮，教授中有声誉鹊起的徐志摩，学生中有方玮德与陈梦家。关露进校时，他们虽早已离开，但学生们还时常朗诵他们的诗作。

关露自幼喜欢读古诗，进中央大学后迷上了新诗。后来她在四十年代初参加上海《杂志》